

# 用誰的語言？解釋啥人的歷史？ ——「台灣歌仔」與台灣知識份子 對「戴潮春抗清事件」論述的比較

Teng Hongtin 丁鳳珍<sup>1</sup>

台中師院台灣語文學系兼任講師、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 摘要

本論文以記載台灣清領時期「戴潮春抗清事件」ê 台灣人著作爲研究對象，in ê 文字 lóng 是漢字。包含用台灣 Hō-ló 話白話音寫 ê 《辛酉年一歌詩》、《相龍年一歌詩》，用台灣客語寫 ê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kah 台灣知識份子用清國官話寫成 ê 文言著作：彰化縣舉人陳肇興 ê 《咄咄吟》、竹塹團練首林占梅 ê 詩作、彰化文人吳德功 ê 《戴案紀略》、鹿港文人蔡青筠 ê 《戴案紀略》。透過台灣 Hō-ló 語白話音、台灣客語、清國官話文言這 3 種無相共 ê 語言，chit-kóa 著作對「戴潮春抗清事件」ê 歷史觀點，有真大 ê 差別。特別是《辛酉年一歌詩》kah 《相龍年一歌詩》，替「被統治者」kah 「起義者」kā 歷史 ê 解釋權搶轉去，是台灣人珍貴 ê 文學遺產。

**關鍵字：**台灣說唱、台灣歌仔、辛酉年一歌詩、民變、戴潮春、戴萬生

## 1. 戴潮春事件及其相關史料

### 1-1. 戴潮春事件概述

1862年3月，台灣爆發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的人民起義——戴潮春事件，從1862年3月起事到1865年間，歷時3年以上。被認爲是清領時期台灣三大民變之一<sup>2</sup>。

「戴潮春事件」以林豪(1831-1918)《東瀛紀事》<sup>3</sup>記載最詳細，可代表統治論述對此一事件的基本看法。

林豪指出：戴潮春，字萬生，彰化縣凍東堡四張犁(在今台中市北屯區)人，原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家境富裕，世爲北路協稿識。咸豐11年(1861)冬季，北路協副將夏汝賢是禍首，因爲他向戴潮春索賄不成，便將戴潮春世襲的武職(北路協稿書)革去，促使戴潮春招集其兄戴

---

<sup>1</sup> 台中師院台灣語文學系兼任講師、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歌仔冊」中的台灣歷史詮釋》，2005.1)。

<sup>2</sup> 見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台灣三大民變》(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3)。

<sup>3</sup> 林豪《東瀛紀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

萬桂的八卦會舊黨，成立天地會，以團練助官為由，私下結黨，陰謀叛亂。<sup>4</sup>同治1年(1862)3月9日，「台灣道孔昭慈聞會黨滋蔓」，派淡水同知秋日觀前往彰化縣辦會黨。

自同治1年(1862)3月20日，彰化縣城被戴潮春的軍隊攻下之後，彰化縣、淡水廳、嘉義縣境都陸續發生武裝反抗政府的事件；原駐台灣的官兵勦辦不力，同治1年台灣道台孔昭慈、台灣鎮總兵林向榮都相繼自殺，續任台灣道台洪毓琛也病故；其間，清廷派來援台的官兵有：福建福寧鎮總兵曾玉明<sup>5</sup>在同治1年(1862)5月帶600名兵力抵鹿港，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在同治1年(1862)12月領兵3000名抵達台灣府城，隔年1月揮軍北上，同治2年(1863)3月記名總兵曾元福率領1000名台勇抵達鹿港。從同治1年(1862)3月到同治2年(1863)9月之間，官兵始終無法順利平亂，也無法收回彰化縣城。

直到同治2年(1863)年9月9日新任台灣道台丁日健從滬尾(今淡水鎮)登岸，帶兵3000名，10月進駐淡水廳竹塹城；以及同治2年(1863)年10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領兵從嘉義縣麥寮登岸；官兵終於在11月3日收回彰化縣城；12月丁日健斬殺戴潮春；同治3年(1864)1月林日晟也被林文察斬首分屍。

據當代學者羅士傑研究：台灣本土地方菁英經過近150年的資本累積，加上1860年台灣開港貿易，使台灣本土的地方菁英具有與官方「分庭抗禮的趨勢」，「1862年的戴潮春案即可視為當時地方菁英彼此間在長期利益競爭的基礎下所產生的武力衝突事件。」<sup>6</sup>

## 1-2. 統治論述

統治論述主要是指官方文獻的論述，論述者包含帝王、各級官員以及依附統治者的知識份子，內容包含宮廷檔案、官員奏摺、官修方志史書、文集雜著，這一類的論述反映了官方的態度，認同統治者的立場。<sup>7</sup>

### 1-2-1. 清國內地人的著作

以當時人記載戴潮春事件，第一手的統治論述文獻，主要如下：

收錄當時清穆宗諭各級官員的公文及官員奏摺的《大清穆宗成皇帝實錄》<sup>8</sup>，及其他官方文書。1863年來台平亂的台灣道台丁日健於清同治6年(1867)付印的《治台必告錄》<sup>9</sup>。

---

<sup>4</sup> 詳見林豪《東瀛紀事》卷上〈戴逆倡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pp.1-3。

<sup>5</sup> 曾玉明在同治1年(1862)5月抵達鹿港，當時他的官職是福建福寧鎮總兵，到同治1年(1862)12月21日清穆宗才將他調為台灣鎮總兵，而四川建昌鎮總兵林文察，則轉調為福建福寧鎮總兵。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穆宗實錄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p.40)。

<sup>6</sup> 詳見羅士傑《清代的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清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為討論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p.99。

<sup>7</sup> 關於統治論述的內涵，許文雄在〈相看都討厭：清朝統治者和台灣人民互相敵對的態度〉中指出：「皇帝的諭、旨、廷寄，官員的奏摺、題本、和著作組成統治論述。」(發表在「第七屆台灣歷史

1862年來台寓居的林豪(1831-1918)於1870年付印的《東瀛紀事》<sup>10</sup>，詳細記載與戴潮春事件相關的史事。

廣東文人吳子光(1819-1883)在戴潮春事件時，正好來台灣遊歷，避難在淡水廳，在他的著作《一肚皮集》(1875自印)中，有少數篇章提及戴潮春事件，特別是他於戴潮春事件後不久所寫的〈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sup>11</sup>。

### 1-2-2. 台灣人的著作

彰化縣舉人陳肇興(1831-1876後)<sup>12</sup>於1862-1863年間所寫的一系列詠史詩《咄咄吟》<sup>13</sup>，記載陳肇興遭遇戴潮春事件的經歷與看法。

淡水廳竹塹團練首領林占梅(1821-1868)的詩集《潛園琴餘草》，也有論及戴潮春事件，特別是組詩〈南征八詠〉。<sup>14</sup>

彰化縣的吳德功(1850-1924)於1894年參與台灣通誌纂修時，所整理的《戴案紀略》<sup>15</sup>；鹿港蔡青筠(1868-1927)於1923年所整理的《戴案紀略》<sup>16</sup>，都以林豪的《東瀛紀事》為母本，並整理第一手的統治論述，兼採耆老說法及鄉間傳說，採取編年紀事體例。雖然不是第一手的史料，但是彙整許多史料，並以「戴案」為名，是研究戴案的重要參考文獻。

### 1-3. 台灣說唱

台灣說唱屬於台灣民間漢語系的彈唱曲藝，清代中葉以來在台灣地區普遍流傳。由於是唱給一般民眾聽，因此使用白話——日常生活詞語。「歌仔」的唱本稱為「歌仔冊」，又叫做「歌

---

與文化研討會——主題：社會變遷及族群融合」，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4.2.6-7舉辦，p.1-2。）

<sup>8</sup>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穆宗實錄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本書依據1963年11月台灣銀行發行的台灣文獻叢刊第190種重新勘印)

<sup>9</sup> 丁日健(編著)《治台必告錄》(上)(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本書依據1959年7月台灣銀行發行的台灣文獻叢刊第17種第1-4冊重新勘印)

<sup>10</sup> 林豪《東瀛紀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

<sup>11</sup> 吳子光〈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收在吳子光《一肚皮集》(卷四傳上，本書依據1875年吳氏雙峰草堂自刊本翻印，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2，龍文出版社/印行，1997.6.30)，第二冊 pp.258-267。後又被收錄於吳子光《台灣遊記》(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36種，1959.2)，pp.51-54。

<sup>12</sup> 陳肇興的生卒年採用林翠鳳的說法，詳見：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台中：弘祥出版社/發行，1999.8，pp.4-5。

<sup>13</sup> 陳肇興，《咄咄吟》，陳肇興，《陶村詩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卷七、卷八，pp.91-138。

<sup>14</sup> 見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202種，1964.11)，pp.132、141。

<sup>15</sup>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5.31。(轉印自台灣銀行版本)

<sup>16</sup> 蔡青筠，《戴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

06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北：台灣銀行/發行，1964.11。

仔簿」、「歌冊」。王順隆估計，從清·道光7年(1827)至今，「歌仔冊」發行過的種類超過1500種。<sup>17</sup>

有兩種Hō-ló語的歌仔以「戴潮春事件」為主題：一是《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的紅旗反、戴萬生反清歌)；二是高雄縣田寮鄉曾傳興(1911-?)的毛筆手抄本，無歌名，筆者以第一句歌詞名之為《相龍年一歌詩》<sup>18</sup>，為目前僅見的抄本。

客語的《新編戴萬生作反歌》，則是站在客家義民的立場來演唱「戴潮春事件」。

透過說唱藝人與聽眾實際的現場互動的這種獨特的藝術型態，導致「台灣歌仔」這種俗文學比其他純文學與史書更加具有開放性、大眾性與變異性。

## 2. 台灣 Hō-ló 語「歌仔」：《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

### 2-1. 《辛酉一歌詩》(戴萬生反清歌、天地會的紅旗反)

《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的紅旗反、戴萬生反清歌，約在1925年由楊清池彈唱，賴和將之記錄為文字，1936年宮安中整理發表在《台灣新文學》雜誌<sup>19</sup>，共分三期刊載，作者署名「彰化 楊清池」。宮安中指出：「由全篇歌詞中的那種坦直單純的話語、所表達出來的農底渾厚樸質的情感、任誰聽着聽着也不能不為之打動啊！這是現今流行的一般歌曲所望塵不及的。」

1960年廖漢臣發表〈彰化縣的歌謠〉<sup>20</sup>，在「乙、民歌」這一類中的第四首為《戴萬生反清歌》<sup>21</sup>，廖漢臣註明這首歌原題《辛酉一歌詩》、《天地會的紅旗反》。

1995年連慧珠完成碩士論文《「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sup>22</sup>，探討《辛酉一歌詩》和《新編戴萬生作反歌》<sup>23</sup>。連慧珠指出這兩首歌謠的主旨都在「規勸世

---

<sup>17</sup> 關於「歌仔冊」的出版史，以及現存書目，詳見以下幾篇論文：(1)王順隆〈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台灣風物》v43n3(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3.9.30)，pp. 109-131。(2)王順隆〈閩台「歌仔冊」書目·曲目〉，《台灣文獻》v45n3(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9)，pp. 171-271。(3)王順隆〈「歌仔冊」書目補遺〉，《台灣文獻》v47n1(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3)，pp. 73-100。

<sup>18</sup> 曾傳興(1911-?)/手抄，《相龍年一歌詩》(原歌無題目，此以該歌首句為題目)，毛筆手抄本歌仔冊，高雄縣田寮鄉西德村蛇仔穴，日治時期，共25頁。(蔡承維先生提供影本)

<sup>19</sup> 楊清池(演唱)、賴和(記錄)(1925-1926)、宮安中(潤稿)(1936)《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底紅旗反〉)，共分三期連載於1936年的《台灣新文學》(台中：台灣新文學社；(一)，1936.9.19，v1n8，pp.125-132；(二)，1936.11.5，v1n9，pp.63-72；(三)，1936.12.28，v2n1，pp.63-67)。

<sup>20</sup> 廖漢臣〈彰化縣的歌謠〉，《台灣文獻》v11n3(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9.27)，pp.23-36。

<sup>21</sup> 楊清池(演唱)、賴和(記錄)(1925-1926)、宮安中(潤稿)(1936)、廖漢臣(校註)《戴萬生反清歌》(原題《辛酉一歌詩》，又題《天地會的紅旗反》)，收錄在廖漢臣〈彰化縣的歌謠〉，《台灣文獻》v11n3(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9.27)，pp.23-36。

<sup>22</sup> 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5.6)。

人勿輕蹈謀反，但是此間所共享的意識型態並非為儒家所提倡的忠貞、節義等道德觀，而是謀求身家財產繼存的現世要求及功利性格。」<sup>24</sup>

1997年陳憲國、邱文錫編註的《辛酉一歌詩》，收在《台灣演義》<sup>25</sup>一書中，是目前註解最詳盡的版本，並且逐字加上羅馬音標與ㄅㄆㄇ音標，並將原文的漢字改寫成較嚴謹的台語漢字。

## 2-2. 《相龍年一歌詩》

《相龍年一歌詩》是高雄縣田寮鄉曾傳興(1911-?)的毛筆手抄本，無歌名，筆者以第一句歌詞名之<sup>26</sup>。由於文字抄寫者沒有說明來源，而且抄錄者已經去世，因此無法確知其實際演唱的方式；但是可以確知的是這首歌詩的抄寫年代為台灣日治時期<sup>27</sup>。

《相龍年一歌詩》唱詞中有幾處有「只牌、丑、旦」、「丑白、旦白、不盡白」<sup>28</sup>這類的文字，「牌」應是曲牌，「丑」、「旦」是戲劇角色名稱，「白」是說白，由此可知，這一首歌詩有戲劇成分在內。

筆者對照宜蘭縣文化局出版的一系列「本地歌仔(戲)」的戲文(也被稱為「歌仔冊」)，發現其中有一些常見的語句與《相龍年一歌詩》相同，如：「清早起來天光時」、「一時有主意」、「掠話就應伊」、「聽着笑微微」，而且這些本地歌仔所使用的手抄「歌仔冊」，和台灣唸歌的唱本「歌仔冊」大致相同，但由於是戲文，所以偶爾(不多見)會出現「口白」二字，或在歌詞上方直接寫出角色姓名，目的應在說明該段歌詞由那一角色演唱。<sup>29</sup>「本地歌仔(戲)」是「台灣歌仔」與「車鼓小戲」兩種藝術的結合，起源約在1900年代以前，距今有一百年以上

---

<sup>23</sup>天賜(重抄)(1936)、洪敏麟(收藏)、連慧珠(打字)《新編戴萬生作反歌》，收錄於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5.6)，pp.141-155。

<sup>24</sup>見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5.6)，p.82。

<sup>25</sup>陳憲國、邱文錫(編註)《辛酉一歌詩》，收錄於陳憲國、邱文錫(編註)《台灣演義》(台北：樟樹出版社，1997.8)，pp.91-176。

<sup>26</sup>曾傳興(1911-?)手抄，《相龍年一歌詩》(原歌無題目，此以該歌首句為題目)，毛筆手抄本歌仔冊，高雄縣田寮鄉西德村蛇仔穴，日治時期，共25頁。(蔡承維先生提供影本)

<sup>27</sup>據筆者電話訪問搜集到此一歌詩的蔡承維先生，他指出曾傳興在台灣日治時期抄寫這一首歌詩。(2004年10月22日)

<sup>28</sup>施炳華：「不盡白」即讓演者自己表現。(2004.10.13)

<sup>29</sup>詳見宜蘭縣文化局出版的一系列「本地歌仔」戲文(歌仔冊)：1.陳旺欉、林走坐、林木枝、林爐香、陳松、葉木塗、何阿通(演唱)、林茂賢(文案)《台灣戲劇音樂集：本地歌仔 山伯英台》(1997.7，1書8CD)。2.林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一 山伯英台(上)(下)》(1997.7)。3.林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二 陳三五娘(上)(下)》(1998.10)。4.林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三 呂蒙正》(1999.8)。5.林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四 什細記》(1999.6)。

的歷史，在1920年代「改良歌仔(戲)」興起後，「本地歌仔(戲)」仍在台灣農村、鄉間被演出。<sup>30</sup>筆者懷疑《相龍年一歌詩》也許是一本「本地歌仔」的戲文。

同時，《相龍年一歌詩》以「唱出」「一歌詩」為開場白，這又是傳統「歌仔冊」的開頭慣用語。<sup>31</sup>歌詞中常用的「一时有主意」，在歌仔冊《新刊台灣陳辦歌》中也出現數次；又筆者檢索王順隆「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sup>32</sup>，也發現「清早起來天光時」、「一时有主意」、「力(掠)話就應伊」這些語句在一些「歌仔冊」中也出現過。<sup>33</sup>又，《相龍年一歌詩》的文字形式與內容，和《辛酉一歌詩》的前半段極為相似，而《辛酉一歌詩》確實來自說唱藝人的彈唱。因此，筆者也懷疑《相龍年一歌詩》曾被以「念歌」的方式彈唱。

從「歌仔冊」的用途來看，它本來可作為「念歌」的唱本，後來又被當作「本地歌仔」的戲文；因此，筆者仍將《相龍年一歌詩》界定為「歌仔冊」。

就地域來講，《辛酉一歌詩》採集於台灣中部的彰化縣，而《相龍年一歌詩》則來自於台灣南部的高雄縣；就文字記錄時間來看，都在台灣日治時期被記載<sup>34</sup>。筆者懷疑這兩首歌有一個共同的母本根源，後來在不同地域傳唱演出，促使這兩首歌詩後半段的內容有所不同；同時，這一歌詩也可能成為戲劇的戲文來源，因此，《相龍年一歌詩》中才會出現「只牌、丑、旦」、「丑白、旦白、不盡白」這類的文字。筆者從這兩首歌詩的內容有很多與歷史事件相吻合的情形看來，其創作時代應在清領時期，在同治4年(1865)戴萬生事件大致被平定之後，由民間藝人創作。

---

<sup>30</sup> 關於「本地歌仔(戲)」的介紹，詳見：1.陳進傳(等著)《宜蘭本地歌仔——陳旺欉生命紀實》(台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12)，pp.12-22。2.楊馥菱(著)、曾永義(校閱)《台灣歌仔戲史》(台中市：晨星出版公司，2002.12.30)，pp.61-66。

<sup>31</sup> 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

<sup>32</sup> 王順隆「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http://www32.ocn.ne.jp/~sunliong/>。

<sup>33</sup> 「清早起來天光時」、「清早起來天光明」、「清早起來天漸光」、「清早起來細思量」、「清早起來鬧猜乜」、「清早起來先敬茶」、「清早起來日頭紅」(新竹：竹林書局286冊《英台留學歌》、台中：瑞成書局959冊《梁祝回陽結為夫妻歌(上本)》、廈門：手抄本1331冊《三伯英台》、廈門：手抄本1327冊《孟姜女》、廈門：手抄本1335冊《陳三五娘》、廈門：手抄本1340冊《陳三五娘歌》、嘉義：捷發出版社678冊《三伯想思歌》、廈門：手抄本1328冊《陳三歌》)。「一时有主意」、「一时有主張」(廈門：手抄本1327冊《孟姜女》、廈門：手抄本1328冊《陳三歌》、廈門：手抄本1340冊《陳三五娘歌》、台中：瑞成書局959冊《梁祝回陽結為夫妻歌(上本)》)。「力話就應伊」、「見說就應伊」、「力話自應伊」(廈門：手抄本1327冊《孟姜女》、廈門：手抄本1331冊《三伯英台》、廈門：手抄本1340冊《陳三五娘歌》)。

<sup>34</sup> 1936年宮安中將賴和(筆名「懶雲」)約十年前(1926年左右)所記錄的《辛酉一歌詩》重新整理，分三期發表在《台灣新文學》(台中：台灣新文學社，(一)：1936.9.19，v1n8，pp.125-132，(二)：1936.11.5，v1n9，pp.63-72，(三)：1936.12.28，v2n1，pp.63-67)。

### 3. 台灣客語「歌子」《新編戴萬生作反歌》

1995年連慧珠完成碩士論文《「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sup>35</sup>，該書從歷史與民間文化的角度，討論了一首《新編戴萬生作反歌》，據連慧珠所述，這首歌是站在客家義民的立場來演唱1961-1963年的「戴潮春事件」，但是連慧珠沒有進一步指出這應是一首客語的長篇敘事歌。筆者閱讀連慧珠所打字的全文版本之後，發現其中有一些詞彙是客語專有的，如：「台灣原『係』龜蛇形」、「三位算來『係大哥』」、「縮『轉』呂朗『大火房』」、「『景景』收兵入內山」、「『後生』<sup>36</sup>貪才做民壯」、「皆因打死有『悍多』」、「作反一案『分奔其』」、「『上』埔寮下未前破」、「人馬出到『伯公』<sup>37</sup>下」。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七字一句，每行三句，字數在7800字以上。這首歌的末六句為：「粗俗歌子不成文，留來日後可傳存。大會拜盟頭上包，紅巾故曰紅巾記。編成一本紅巾記，萬歲千秋同治君。」「歌子」是編歌者對這首歌謠屬性的稱呼，「一本紅巾記」應是歌名。

### 4. 台灣庶民的歷史觀 V. S. 清國統治者的歷史觀

#### 4-1. 對台灣漢人起義事件的理解與評價

聚眾公然攻擊官員、反抗政府，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是亂黨逆賊，大逆不道，禍及子孫；但是，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卻不見得認同統治者這種觀點。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論述台灣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的民變——戴潮春起義事件。這兩首歌詩論述的第一個重點，就擺在「官逼民反」這個導火線，對於咸豐11年(1861)台灣道孔道台剝削台灣百姓的惡行，做了很生動與詳細的描寫；第二個論述重點則在戴潮春等人起義反抗官府，為民報仇，攻城殺官。

《相龍年一歌詩》只寫到戴潮春英勇斬殺貪官污吏，之後「功成身退」，解散武裝的群眾，並勸告群眾致力做人應該努力賺錢，自食其力。反映出台灣庶民對安定生活的期望，因此，百姓與戴潮春的反抗舉動，純粹是被動的自我防衛；一旦威脅百姓安定生活的貪官污吏被除去之後，百姓就自然回歸本位，繼續為眼前的生活努力打拼。

在《辛酉一歌詩》最後雖以「謀反」、「叛反」來定位戴潮春等人的起義，表面是勸人不要謀反，實際上是在告訴大家：如果謀反就會失去生命、財產、家園。筆者認為歌者之所以如此勸戒世人，警告大家不要意圖謀反，其原因不在於統治者的至高至尊，也不是因為不可以推翻官府；而是因為輸在形勢比統治者弱，因為無法成功，還落得下場淒涼，於是不得不忍耐。

<sup>35</sup> 天賜（重抄·1936）、洪敏麟（藏）《新編戴萬生作反歌》，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5.6），pp.141-155。

<sup>36</sup> 台灣客語稱年輕人為「後生」。

<sup>37</sup> 台灣客語稱土地公為「伯公」。

客語的《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雖然嘲笑戴潮春造反不成；不過，在這首歌中，指出戴潮春本來無意作亂造反，促成他造反的導火線有四：一是林天河誣陷他造反；二是台灣鎮道被林文察收買，硬是要以造反罪名剿辦他；三是戴潮春的兄弟批評「官府來迫反」，指出絕大多數的民心都向著戴潮春，建議他造反；四是林晟殺害秋日觀，局勢大亂，戴潮春因此被林晟拖累。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對於反抗政府、推翻政府等行爲，抱持著否定的態度；不像《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認爲統治者若是不公不義、貪污腐敗，百姓就可以起來抗暴。不過，《新編戴萬生作反歌》對於謀反者戴萬生(戴潮春)被逼上造反一途的諸多描寫，也反映出作者對造反者處境的同情。

而在彰化縣舉人陳肇興的《咄咄吟》、林占梅的詩集《潛園琴餘草》、吳德功《戴案紀略》、蔡青筠《戴案紀略》都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否定戴潮春等人的謀逆行爲，並稱這些起義者爲「賊匪」、「逆賊」、「賊黨」。

## 4-2. 台灣人的形象

### 4-2-1. 起義領袖的形象：為民除害的大哥 v.s. 大逆不道的賊匪

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對所有參與反抗陣營的主要領導者，都一律以「大哥」、「眾大哥」來稱呼他們。由此可見，歌者對這些反抗政府的人物，採取比較肯定的作法，因此使用反抗陣營的尊稱「大哥」來稱呼這些人。

限於論文字數限制，本處只舉戴潮春一人加以說明。

戴潮春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都被認定是反抗陣營中的首領。不過，在《辛酉一歌詩》中，戴潮春所佔的篇幅並不會比林晟、陳弄、呂梓來得多，歌中對他的稱謂詞，也沒有特別之處，他和其他大哥都被稱爲「大哥」，這應該也反映出戴潮春在戴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辛酉一歌詩》極力鋪寫戴軍的大哥級人物，以突顯戴軍人才濟濟，兵力強盛。雖然有數次的攻城掠地沒有成功，但是，戴軍的氣勢始終比官軍強盛；戴軍中的多位大哥，如：林晟、呂梓，臨死前，也比官員被殺前，來得更有氣魄，寧死不屈。

在《相龍年一歌詩》中，戴潮春被極度英雄化，成爲戴案中最佳男主角、唯一的大哥，在《相龍年一歌詩》中，戴潮春之所以率眾反抗政府，來自於他的見義勇爲，百姓的仇恨報了之後，戴潮春便解散部眾，鼓勵大家當一個自力更生的良民，又展現他不戀棧權位與不迷信暴力的氣度。這樣的戴潮春，與其它史料所記載的貪戀權位、死於戰場的戴潮春形象截然不同。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的題目明確指出「戴萬生」「作反」，可見戴潮春是最關鍵的人物。歌中對戴潮春的描寫，有時採取同情理解的角度，如寫他被林天河陷害，以及林戇城拖累；有時則採取嘲諷鄙視的態度，如他結定造反時，作者稱清穆宗爲「賢君」，說戴潮春是「賊蟲」；當戴潮春進佔彰化城後，濫殺無辜，作威享樂，作者說：「萬生真真是村夫」；在歌詞最後，



作者對戴潮春被平定的事實，以「可笑萬生反不成」來為戴潮春定位，並以「萬歲千秋同治君」作結。由上可見，戴潮春在《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並不受到尊敬，只有同情和嘲諷而已，他的角色猶如跳樑小丑般，引人同情與發笑。

彰化縣舉人陳肇興(1831-1876後)於1862-1863年間所寫的一系列詠史詩〈咄咄吟〉<sup>38</sup>，其內容記載陳肇興遭遇戴潮春事件的經歷與看法。詩句中，沒有特別描寫戴潮春個人，不過，在〈殉難三烈詩〉的序中，也稱戴潮春為「戴逆」<sup>39</sup>，詩中另有「賊王」一詞，應當也是指戴潮春。<sup>40</sup>

淡水廳竹塹團練首領林占梅(1821-1868)的詩集《潛園琴餘草》，也有論及戴潮春事件，特別是組詩〈南征八詠〉。在林占梅的詩中對戴潮春個人並無進一步的吟詠，只是提到戴潮春時，稱他為「戴逆」、「戴匪」。<sup>41</sup>

吳德功(1850-1924)的《戴案紀略》有時稱戴潮春為「戴逆」，但是更常直接稱他為「戴潮春」、「潮春」，也指出戴潮春的行爲是「結會作亂」。<sup>42</sup>吳德功批判戴潮春「庸懦無能」<sup>43</sup>，不懂作戰，身邊又沒有敢戰的手下，戴潮春之所以能成為逆首，是因為他到處「鼓動豪猾，逢人以將軍相贈」，最重要的原因是：天意如此。<sup>44</sup>

蔡青筠(1868-1927)的《戴案紀略》認為戴潮春的行爲是「結會作亂」。<sup>45</sup>書中對戴潮春有以下評語：「嘗聞之先輩，言戴逆雖略有識字，然懦柔不斷。」<sup>46</sup>

#### 4-2-2. 台灣百姓

就目前所見的戴潮春事件相關史料，幾乎都直接從同治1年(1862)台灣道台孔昭慈前往彰化縣剿辦戴潮春的會黨寫起；但是，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卻都從咸豐11年(1861)冬，台灣府城對百姓開徵釐金，導致台灣府城的商民罷市反抗，以此作為戴潮春反抗政府事件的序曲。在1861年的台灣府城，官府是百姓的剝削者，但是，百姓的強悍卻也讓官員大吃一驚。除了「眾百姓」之外，台灣府城的地方總理與三郊董事(頭家)也強力反抗官府，並成為百姓堅強的後盾。

<sup>38</sup> 見陳肇興《咄咄吟》卷七、卷八，《陶村詩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pp.91-138。

<sup>39</sup> 見陳肇興《咄咄吟》卷七、卷八，《陶村詩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p.124。

<sup>40</sup> 見陳肇興《咄咄吟》卷七、卷八，《陶村詩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pp.107、112。

<sup>41</sup> 見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202種，1964.11)，pp.132、141。

<sup>42</sup> 詳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5.31)，pp.3-9。

<sup>43</sup> 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5.31)，p.56。

<sup>44</sup> 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5.31)，p.18。

<sup>45</sup> 詳見蔡青筠《戴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06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北：台灣銀行/發行，1964.11)，pp.1、3-6、11、15、18-20、24、52-54、58、60)。

<sup>46</sup>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06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北：台灣銀行/發行，1964.11)，p.51。

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可以生動的看到台灣府城百姓強悍抗官的言行舉止，這兩首歌的歌者都認為是「民氣可用」，因為官府壓榨百姓，所以百姓造反有理，也因而演變成後來的「戴潮春事件」。這兩首歌仔都將論述的焦點放在官方與百姓的對抗過程；對於無助無依的無辜百姓，雖寄予同情，但敘述都不多。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對無辜受害的百姓也有許多同情的描寫。批評戴軍「殺官害民天不容」，因此，戴潮春等人死後，百姓因而得以安居樂業。

陳肇興(1831-1876後)在詠史詩《咄咄吟》中對被戴軍欺凌的無助百姓有很同情的描寫。在所有描寫戴潮春事件的史料中，陳肇興的《咄咄吟》對苦難百姓的描寫最為深沉與哀傷。

林占梅(1821-1868)的詩集《潛園琴餘草》對百姓的描寫很少，他感嘆彰化縣城的百姓的「哀聲」「斷人腸」，指出「撫民」是當務之急。

在吳德功《戴案紀略》(1894)、蔡青筠《戴案紀略》(1923)中，對百姓的描寫，着重在百姓的無辜、苦難，以及百姓不得不武裝自己來保衛家園的情形。這是清國官員的奏摺與清穆宗實錄中所忽視的部分。

#### 4-2-3. 台灣「義民」、「台勇」

「義民」是指在變亂發生時期，協助清國統治者，討剿叛亂犯，維持地方安定的漢人。通常義民是以集體型態出現，也就是「民間自衛武裝組織」，帶頭的人就是「義首」。義民在平日是一般百姓，與固定領軍餉的營兵不同。在清國內地也有義民的出現。<sup>47</sup>

台灣籍的臨時傭兵，稱為「臺勇」、「民壯」。滿清統治台灣期間禁止台灣人當兵，台灣的班兵都是由內地派來。不過，因為台灣人熟悉環境，加上官吏藉機貪汙，雇用台灣兵又可免支付內地眷糧及行糧，尤其是戰爭爆發，兵力不足，因此時常需要台勇助戰。所以清領時期，台灣兵不可或缺。<sup>48</sup>

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從清國內地派來鎮守台灣的綠營兵不堪一擊，台灣本地的「民壯」、「台勇」紛紛加入戰局，負責保護官員，對抗戴軍；但是他們不時有背叛官兵的行為發生。

《辛酉一歌詩》對於背叛者、變節者有所批評，如，林晟先是要保護官員，沒想到卻變成反抗官府，對他的這種行為，作者說他是「逆生」(禽獸)。加入戴軍，後來背叛戴軍，並協助官兵來攻戴軍的黃豬哥與吳墻(吳志高)，雖然變成官方的「義民」，但是，卻被《辛酉一歌詩》譏為「蓋生神」(意近厚臉皮、不要臉)。

<sup>47</sup> 本段有關「義民」的解說參考丁光玲《清代台灣義民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9)，pp.2-4。

<sup>48</sup> 對台灣人在清領時期當兵的研究，詳見許雪姬《清宮台灣的綠營》〈第七章 綠營中的台灣兵——附台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4)，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5初版，pp.380-383)。

《辛酉一歌詩》的最後，敘述林文察帶領「台灣勇」前去清國內地，協助清國政府平定太平天國，呈現出台灣人急於在清國統治者面前力求表現的一面。林文察最後說：「若是敗兵的代誌，臺灣勇愛來去。」台灣勇未必一定要去幫清國打仗，但是，身為次級國民的台灣人，藉由報效國家的軍事行爲，卻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林文察就是最好的例子。

陳肇興在《咄咄吟》中對義民有頗多的論述，因為陳肇興本人就是義民的身分。他指出台灣義民急公好義，而官兵卻貪生怕事。陳肇興指出台灣人之所以會成爲義民，不只是單純的爲了報效國家，更切身的利害關係在於保衛家園與家人。

身為義民領袖、地方團練首的林占梅，在詩中指出支付龐大義勇軍餉的艱難，並描寫義軍凱歸時，民眾夾道歡迎，顯然百姓是站在義民這一邊。

在吳德功《戴案紀略》(1894)、蔡青筠《戴案紀略》(1923)中，協助官兵的台灣人稱「義勇」，書中對於義民台勇的記載也很多，英勇善戰的台灣義勇與缺乏戰鬥力的官兵，成爲明顯對比。特別是對竹塹人林占梅、塗庫義民陳澄清，以及他們所募的台勇有詳細的記載與讚賞。

#### 4-2-4. 台灣客家人：義首羅冠英、客婆嫂

義首羅冠英(羅阿賊)，字福澤，是彰化縣東勢角莊(在今台中縣東勢鎮)的客家人，他是地名的「勇首」，駐軍在翁仔社(在今台中縣豐原市)，同治1年(1862)3月底到4月初，戴潮春與林日晟帶領數萬人，合攻阿罩霧前厝莊(今台中縣霧峰鄉甲寅村)林家，羅冠英曾帶領200名客家屯勇前來協助擊退戴、林的軍隊。<sup>49</sup>後來也數次帶兵到大甲城，擊退戴、林的軍隊。<sup>50</sup>

在《辛酉一歌詩》中的「羅阿賊」，就是東勢客家義首羅冠英。歌中以「羅阿賊」來稱呼他，似乎含有貶意，對他的論述很少，只描寫他被「客婆嫂」槍殺的死狀。作者寫到羅冠英聽到客婆嫂的聲音，心情很興奮，毫無防備之心，可見羅阿賊是一位迷戀女色的人，最後文武官員只好邊哭邊抬他的棺木回營。

客家義首羅冠英在統治論述中的形象極佳。死後，清穆宗下旨爲他建立專坊。

在客語的《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客家人羅冠英被稱爲「羅澤」、「澤哥」、「澤兄」(字福澤)，他是整首歌中的第一主角，最了不起的英雄。羅冠英在《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的仁義形象，與統治論述極爲相似。

在《辛酉一歌詩》中，唯一一位佔有較長篇幅的女性，是一位客家婦女。在歌中，她列名同治1年(1862)5月戴軍進攻嘉義縣的大哥名單中。同治3年(1864)3月底，官兵攻打陳弄，由客家義首羅冠英(羅仔賊)當先鋒，陳弄以金錢獎賞，請客婆嫂將羅冠英擊斃。可見這位客家婦女的膽量與能力。

---

<sup>49</sup> 羅冠英救援霧峰林家的記載，詳見林獻堂〈先伯父文鳳公家傳〉(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霧峰林氏族譜》，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4.12.31，p.109)。

<sup>50</sup> 羅冠英救援大甲的記載，詳見林豪《東瀛紀事》〈大甲城守〉(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pp.19-24)。

#### 4-2-5. 台灣女性

謝國興在《官逼民反——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一書中指出：「戴案中另有具社會史意義而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即婦女地位的突出，這是台灣其他民變事件中極少見的。」<sup>51</sup>在《辛酉一歌詩》中幾位戴軍中的女將，確實是勇猛過人，包含洪花的妻子(李氏)、大腳甚、臭頭招、女嬌娘、北社尾王大媽、黃大媽、廖談細姨、客婆嫂，可惜歌中對這幾位女將的描述太少。而在《相龍年一歌詩》中，則只有提及洪花的妻子一人。《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都說出洪花的妻子比他更厲害；可惜的是，洪花的妻子到底如何厲害，這兩首歌中都沒有論述。

在《辛酉一歌詩》中，唯一一位佔有較長篇幅的女性是「客婆嫂」。如前述。

整體來看，《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這兩首歌仔，都以男性為主體，女性只是其中的小配角。

吳德功《戴案紀略》(1894)、蔡青筠《戴案紀略》(1923)中，對幾位戴軍中的女將有生動詳細的描寫，包含：偽征南大將軍嚴辦的妻子侯氏大腳甚、偽將軍廖談的妾蔡邁娘、偽將軍洪花的妻子、偽將軍呂梓的妻子、偽將軍王新婦的母親、偽將軍鄭大柴的妻子謝秀娘、偽大將軍陳弄的妻子無毛招。這些強悍的女性，她們的丈夫甚至不如她們的勇猛，這些女將的反抗精神比男性還強烈。但是吳德功、蔡青筠卻說他們是「人妖」、「逆婦」。

此外，吳德功、蔡青筠也記載了幾位「烈女節婦」，包含：戴潮春的寡嫂羅氏、大甲城內「節婦余林氏」、戴潮春的妻子許氏、凍東美人蕭氏……。這些婦女都是《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所沒有提到的女性。

#### 4-3. 清國官員與官兵的形象

##### 4-3-1. 清國內地官員與官兵

清國官員在《辛酉一歌詩》中被敘述較多的是：台灣道台孔昭慈、台灣鎮總兵林向榮、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淡水廳同知秋日觀、前北路協副將夏汝賢、官職不詳的周維新，其中以林向榮和孔昭慈的篇幅最多。在歌中死亡的有台灣道台孔昭慈、台灣鎮總兵林向榮、淡水廳同知秋日觀、前北路協副將夏汝賢。

在《相龍年一歌詩》中，被敘述較多的的清國官員是：台灣道台孔昭慈、將軍周衣申(周維新)。這兩位官員在這首歌中所佔的篇幅比《辛酉一歌詩》還多，敘述也更生動；兩人在歌中都被戴潮春所斬殺，百姓對他們的死都十分高興。

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台灣道台孔昭慈是一位剝削百姓的貪官，歌中對台灣道台孔昭慈的敘述都比戴潮春還多，這兩首歌都從台灣道台孔昭慈上任不久，因為清國援台的官銀未到，導致無法發官兵的薪餉寫起。作者雖然批判孔道台剝削百姓，但是對於他「無錢可用」的困境也有著生動的描述。

---

<sup>51</sup> 見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台灣三大民變》(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3)，p.111。

在《相龍年一歌詩》中，完全沒有敘述到台灣鎮總兵林向榮；而在《辛酉一歌詩》中，林向榮所佔的篇幅遠多於戴潮春，與孔昭慈並列為篇幅最多的兩大男主角，可惜，這兩位台灣最高官員，在歌中的遭遇都以狼狽居多，而且都被戴軍逼得走投無路，比自殺了結；更不幸的是林向榮自殺沒有成功，只存一絲氣息的他，死前慘遭陳弄以殺豬刀加以屠宰。堪稱為所有官員中最為淒慘不堪的官員，而他卻又是當時台灣最高軍事領袖，歌詞中對他極盡諷刺。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對孔道台的描寫很少，只是客氣的說：「孔道文官武不通。」歌中有一位「休總兵」，所佔篇幅很少，他收受林文察的賄賂，要來台灣剿辦戴萬生(戴潮春)，「休總兵」可能是「林總兵」之誤寫。對他的死，也只是簡單批評：「志謀不足害自身。」

在台灣知識份子陳肇興《咄咄吟》(1862-1863)與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的詩作中，則歌頌孔昭慈、林向榮。陳肇興誇讚孔昭慈是中流砥柱，誇贊他的自殺是「千秋存大節，一死表孤忠」的義行；死前還「罵賊皆皆裂，憂民淚未終」。陳肇興在詩中稱讚林向榮是「千騎將」，又稱贊林向榮自殺的行為無愧「大義」；而戴萬生(戴潮春)等人的行為，百姓如同被「毒螫」一般痛苦。可見陳肇興對孔昭慈和林向榮的高度評價。而，林占梅以「大星黯淡落空營」來哀悼孔昭慈與林向榮的死，「大星」一詞是一種尊稱。

在吳德功《戴案紀略》(1894)、蔡青筠《戴案紀略》(1923)中，批評孔昭慈固執己見又誤判形勢，指出孔昭慈對於地方突來的變故，欠缺實務經驗，認為他是昏庸無能的書呆子，害民又誤己。關於林向榮的作為，則認為林向榮「舉足一誤，全局皆錯，用違其才，終至債事」，是一位「不明地利、不諳民情」的人，根本不應擔任大將。

將陳肇興的說法與吳德功、蔡青筠的記載相對照，顯然陳肇興是對孔昭慈的誇獎過於濫情與不實，但卻近似閩浙總督慶瑞的奏摺。若再與《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作一比較，更是天壤之別。

#### 4-3-2. 台灣籍的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

林文察(1828-1864)，字密卿，諱有理，賜諡剛潛。林家是彰化縣阿罩霧莊望族(在今台中縣霧峰鄉甲寅村)。咸豐9年(1859)後，林文察與林文明兄弟先後率領台勇內渡協助勦平太平天國革命軍，林文察戰功彪炳，從游擊升為參將、副將、總兵、福建陸路提督(1863)，曾兼署福建水師提督(1863)。<sup>52</sup>

在《相龍年一歌詩》中，完全沒有敘述到林文察。在《辛酉一歌詩》中的所有官員，林文察是最幸運的官員，因為作者對他不但沒有負面的敘述，最後，還以他高貴的為國奉獻的情操做結。也許因為他是這些官員中唯一的台灣人，也或許作者對霧峰林家有著好感吧。

---

<sup>52</sup>林文察升遷記載，見《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穆宗實錄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pp.26、40、49-51)。又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台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出版，1987.10，p.251)。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稱林文察為「林友利」或「林有利」，這應當是「林有理」的誤寫。林文察在這首歌中的形象很差，他的家族先是以族大人多，霸佔了戴潮春家的田產家園；後來戴潮春組會黨自保，林文察的叔叔就誣告戴潮春要造反，林文察並賄絡台灣總兵，請他剿辦戴潮春。戴潮春因而被逼上造反一途。林文察在《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的形象以負面為主，雖然他剿賊很勇猛，但是他陷害戴潮春，賄賂官員，都是很負面的作法。

吳德功《戴案紀略》大多尊稱林文察為「林帥」，並在書中的「總評」中稱林文察為「林宮保」。蔡青筠《戴案紀略》稱為「提督林文察」或「林帥」。<sup>53</sup>

## 5. 語言文字與歷史詮釋權：台灣 Hō-lo 語的白話文 V.S. 台灣客語 V.S. 清國官話的文言文

語言、文字是發言者與詮釋者理念的承載體；發言者與詮釋者透過語言、文字，將他們所認定的世界傳遞給聽者、讀者。也就是說，誰擁有語言文字，誰就擁有編寫歷史、解釋歷史的主宰權。

在大清帝國統治台灣時期，只有極少數的台灣知識份子有能力使用官話，聽得懂官話，以及能閱讀與書寫官方認可的文言文。因此，這些人成為台灣人中的強勢者、有力者、尊貴者。這一現象可在英國人 W.A.Pickering(漢名：必麒麟)在1898年出版的《Pioneering in Formosa》(歷險福爾摩沙)一書中得到佐證<sup>54</sup>：必麒麟從1863到1870年間在台灣從事貿易活動，在1866年他曾造訪嘉義縣一位秀才的宅第，由於必麒麟會講清國官話，因此受到很熱情的款待。必麒麟記述到：「這位紳士是個飽學之士，為了表示恭維，我使用中國的官話應答，不過我們漸漸地都說起本地方言來了。」雖然必麒麟與這位台灣秀才都會講台灣方言(可能是 Hō-lo 話)，但是，在這位秀才心目中，「官話」是比較優越的「人話」。從必麒麟這一段遭遇看來，不會講官話、也聽不懂官話的台灣人，也就淪為被統治、被看不起的無知大眾。

在清國統治台灣211年間(1684-1895)，以台灣人的語言來書寫的白話文學實在十分稀少；當時絕大多數的文字記載都是以清國官話所書寫的文言文，即使是台灣人中的知識分子，他們所留下來的文獻，絕大多數都是採用統治者所認可的語言文字。因此，以台灣客語寫成的《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以及以台灣 Hō-lo 語寫成的《辛酉年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更顯得珍貴。

---

<sup>53</sup>詳見蔡青筠《戴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06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北：台灣銀行/發行，1964.11，pp.50-51、53-56)。

<sup>54</sup>詳見必麒麟(W.A.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台北市：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1)，pp.140-144。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辛酉年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這三首歌詩想必是為台灣漢移民而寫的歌詩，由於，這三首歌是具有商業作用的說唱文學，創作者必須在乎聽眾的感受，必須以台灣庶民的眼睛來論述其背後的政治事件，如此，才有可能產生市場利益。

特別是這三首歌仔，對於歷史事件的描寫，大多可以在史籍文獻找到佐證；但是，這三首歌詩對該歷史事件所採取的詮釋觀點，與絕大多數的統治論述史料，截然不同。其中，《新編戴萬生作反歌》站在台灣客家義民的立場發言；《辛酉年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則以台灣Hō-lō人的立場發言，為台灣百姓與起義抗清者取回自身的歷史解釋權。